

## 绪 论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种族，也是最伟大的民族之一。在历史上，中华民族曾经为人类文明发展与进步做出了伟大的贡献。然而一百多年来，由于种种内在与外在的原因，我们在科学技术发展方面，在为人类进步做出贡献方面落伍了。不仅经济落后，而且在政治上也不止一次地被推入动荡不安之中，伟大的中华民族，竟然多次蒙受被欺压、被剥削、被奴役的耻辱。于是，一切有骨气有血性的中华儿女，开始了为中华民族之崛起而奋斗的历史。今天，当人们把眼光再次投向中华民族时，他们不得不承认，今天的中华民族，已经不再是西方人眼里的东亚病夫，而是一个充满青春和活力的民族，中华民族的未来一定是灿烂辉煌的，这一点甚至连我们的敌对者也不得不承认了。然而，这并不是说我们没有缺点，没有失误甚至灾难。我们不会忘记十年文革给我们民族带来的灾难，这种灾难所产生的影响，恐怕在 21 世纪也不会完全消失。我们也不会忘记，相对于世界其他民族，我们的民族素质从整体上看还是相当低的。为了现实，也是为了未来，我们有责任改造并提高我们的国民素质。那么，作为中华民族的成员，我们是否能够意识到自己缺少什么？

该怎样向世界上其他一些民族学习？又该怎样从自身做起？这，就是本书的主要内容。

当本书付印之时，21 世纪的曙光已经出现，面对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性机遇，每一个中国人都会感到自己的责任重大。“认识你自己”，古希腊人曾经这样说过；“学而时习之”，孔子曾经这样教导我们。先哲之言，虽历经数千载，却依然是指引我们前进的航标。改造我们自己，提升我们的人生境界，把自己的一生融入到整个人类的发展进程之中，这就是我们的责任，也应是每一个中华民族成员的理想。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为了民族的未来，也为了人类的未来，我们要做的事情很多，而在眼下，也许最重要的，就是发展我们的教育，就是教育每一个民族成员，怎样无愧于这个时代，无愧于这个民族，也无愧于这个世界！



在概括阐释本课题的各部分主要内容之前，有必要对几个关键性的概念进行梳理。

首先，是关于“素质”一词。这是我们这个课题的最重要的核心术语，自然要对其内涵与外延给予必要的界定。

要理解“素质”，首先要说清“素”的含义。“素”这个汉字的最初本意是白色的绢，如《礼记·玉藻》篇有“大夫素带，辟垂”之句，又《玉台新咏·古诗八首》中有“新人工织纤，故人工织素”之句。后引申为白色、空、朴素和开始、本原等意。而“素质”作为一个词连用在我国最早见于《逸周书·克殷》：“及期，百夫荷素质之旗于王前。”又《尔雅·释鸟》篇有“伊洛而南，素质五彩皆备

成章……”等，这里的意思都是白色的质地。至春秋后期，“素质”一词开始有了“本质”之意。如《管子·势》篇中有“正静不争，动作不二，素质不留，与地同极”之句。又《文选》中有晋张茂先之《励志诗》其中也有“如彼梓材，弗勤丹漆，虽劳朴斫，终负素质”之句，其含义皆指本质。现代语言学中之词义学认为，“素”指构成事物的基本成分，如元素、要素、素养等。

至于“质”的最初含义则是指抵押，人质，后来才指事物的本体和禀性。例如《易经·系辞》中有“易之为书也，原始要终，以为质也”。又《论语》中有“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之句等。在现代汉语中，“质”则指事物的根本特点，如性质、本质、资质、品质和质量等。因此，“素质”一词，在指事物时，就是表示事物的本来性质；在指人时，即表示人的素养、资质和品质。

在将“素质”用来专门指称人时，目前学术界有以下几种用法：

第一，指“先天素质”，即人的先天的生理特点，主要是感觉器官和神经系统方面的特点，它们是决定人的心理发展的生理基础，但不能制约人的心理内容的形成和改变，而且某些生理素质上的缺陷可以通过后天的学习获得补偿。

第二，指人的“可能素质”，即未来发展的可能性，人在未来的潜在发展能力。与先天素质不同，这里的素质指的是作为主体的个人在其全部心理结构中表现出的可以反映和影响未来发展的那些成分。

第三，指“现实素质”，也即后天的素养，即人在后天通过实践和环境的影响，所实现的作为主体表现出的比较稳定的可以长期保持的基本品质结构和主要内容，例如人的思想、知识、身体状况和心理状态等。这个意义上的素质已经是主体的先天可

能素质在后天的教育和环境的影响下，通过内化所形成的一种比较稳定的现实品格，它决定了个人在社会中所获得的对其能力、人格和教养等方面的真实评价以及给社会和他人的基本印象。

当前 我们国家所提倡的“素质教育”以及“民族素质”等基本上是用第三种含义。我们认为，所谓素质，应当是指具有主体意识的社会人在从事一定实践活动之前所具备的较稳定的、内在的和基本的个人品质的综合，是个体先天的自然性和后天的社会性的有机综合。因为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在评价一个人或一个社会群体的素质高低时，并不会辨析哪些素质是先天就有的，哪些是后天获得的，而是笼统地给予一个整体的评价。而且，真正要全面彻底地分析构成人的素质结构的所有方面，似乎也是不可能的。不过，在本书中，当我们提及要提高全民族素质时，其内涵往往主要指的是“后天的社会性”也即通过教育等可以改变的那部分素质，而非先天继承短期内不可改变的遗传素质 例如人的身体结构、肤色、发色等。

在这里，我们还要指出，应当把基础素质与基本素质区别开来。

所谓基础素质，指的是人在社会生活中为了维持基本的生存和发展而必须具备的基本知识和技能，是每一个民族成员都应具备的最起码的条件。例如能够通晓本民族的语言，懂得为人处世的基本道理，能够借助语言和其他方式与他人基本沟通的能力，能够从事一些最基本的劳动的技术和能力等。而基本素质，则可以理解为从事某项特定工作所具备的基本条件和技能等。例如对于教师而言，则必须具备一定的学历和执教资格，掌握有关的教育理论、教育方式和方法，具有一定的教学实践经

验，以及将自己掌握的知识表达并传授给他人的能力等。一般而言，基础素质是大致相同的，而基本素质则因人而异。例如凡是从事歌唱艺术的文艺工作者都必须具备相当水平的音乐知识和歌唱能力，包括一定的嗓音和表演技巧以及个人表演能力和外貌、身高方面的基本条件等。但对于不同的歌唱艺术又有不同的具体要求，例如从事西洋唱法的歌唱家其对嗓音的要求就与民族唱法截然不同，其平时所从事发声训练的要求也不同。此外，不同时期和不同民族对于基础素质和基本素质的要求也是不一样的，总是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首先，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对人所具备之基础素质和基本素质的要求也相应提高。例如在原始社会，大概人只要具备一定的体力，能够通过狩猎来获取猎物就能够生存，而体力最强壮、狩猎技术最高者就有可能被视为部落的领袖。在中国封建社会，所谓的读书人不过是对一些古籍有所了解，能够作诗撰文，就有可能通过科举进入统治阶级。而在今天，则简单地掌握一些文化知识是远远不够的，知识的更新换代速度之快，迫使每个人即使有很高的学历，也要不断地继续学习才不致落伍，因此终身教育才第一次被提到对民族命运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高度而受到重视。其次，从基本素质的要求看，不同时期和不同社会制度对素质的要求也不同，总是有所侧重的。在战争时期，对军事知识和有关方面的素质自然要求较高，而在平时时期，就会把对从事经济建设的素质要求放在更重要的位置。最后，基础素质和基本素质之间不是什么互相矛盾的关系，而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和相互转化的关系。基础素质是基本素质的基础，而基本素质是基础素质的提高，同时也有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现象。在一定时期属于基本素质的东西，过一个阶

段可能就转化为基础素质了。而在特定社会制度下被视为基础素质甚至不被纳入素质范围的东西，可能在另一个社会中却成为非常重要的基本素质。例如在现代社会，是否具备放牧牲畜的素质对大多数社会成员而言已经不重要或者说不必要了，而这在古代北方的游牧民族中却绝对是每个民族成员的最重要的基础素质。

其次，是关于素质的特点。学术界目前一般认同的大致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相对稳固性。

无论是先天具有的素质还是后天通过教育等手段形成的素质，一旦成为个体整体素质的有机组成部分，就具有了相对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可以保证主体在社会实践中的行为在必要的外在条件得到满足时可以得到预期的结果或者产生必要的思想情感。例如，一个具有较高训练水平的运动员如果没有特殊情况，总是可以指望他在参加比赛时发挥出正常水平的，虽然这种发挥不能保证他每一次都能取得胜利。又如一个较有修养的人在社交场合，一般总是会表现得彬彬有礼、举止大方、应对得体的。

第二，潜在与内化性。

素质从整体而言，在个体中是以潜能的形式存在的，一般不具有外露的特点。而且，素质具有内化性，也即只有经过主体内化成为其身心有机组成部分的那些品质和能力才是素质，单纯的知识 and 能量等不能构成素质。而潜在性和内化性又是有机结合在一起的，因此可以算是一个特点。

第三，发展性。

素质一方面是相对稳定的，一方面又总是处于不断发展之

中的，是随着主体和社会的变化而变化的。这有两层含义，首先，作为主体的个人可以有意识地通过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素质；其次，社会可以从不同的方面对个体素质水平施加影响，而一般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教育。关于教育的概念，这里所说也与传统的理解不同，见下文。

此外，是关于“民族性”与“民族素质”的联系与区别。

所谓民族性，指的是代表一个民族最本质的内在的特性，是该民族文化精神的集中体现，是体现于一个民族文化中的基本精神或意义，是该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基本特点。在这个意义上，民族性又可称为民族性格或国民性。民族性与民族精神有近似之处，不过民族精神一般只是指民族性中有积极意义的成分，其内涵较为单纯。所谓民族素质则是指作为整体的民族所体现出的基本素质的综合，它包括该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两大部分，其中又可以按照不同的分类标准细分为自然素质（先天遗传的生理素质）、心理素质和社会文化素质等等。一般说来，民族性与民族素质的关系是既互相涵盖又互相交叉的关系，不过民族性侧重于指一个民族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特性，而民族素质则是指该民族整体的素质状况水平，其中不少构成成分在其他民族也一定会有的，如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就是所有民族都具备的基本素质，虽然其水平不同。此外，民族性对于民族整体素质的构成与提高，有着极大的制约力和影响力。这种制约和影响甚至有时是决定性的、非人力所能任意改变的。这就告诉我们，在提高民族素质整体水平的过程中，无论实施何种手段，都必须注意和尊重民族性。即使是民族性中的落后成分，也不可采取简单化否定的态度，而必须因势利导，化腐朽为神奇，以富有创造性的转化工作，改造民族性中

的缺陷，从而在根本上为提高全民族素质打下坚实的基础。

最后，是关于作为一般意义的“教育”与本书提出的“大教育”概念的联系与区别。

传统意义上的“教育”，是人类实现认识世界和自我认识之目的的基本手段，是人类将历代流传积累下的所有知识传给后代的最有效的方式，而实现这一教育目的的最合适的地点就是学校。时至今日，学校教育依然是承担此项任务的最重要的社会场所。但是，随着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单纯的学校教育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要求，无论人们在学校所受教育是有多么丰富和完善，在走向社会后，依然面临其所学不能完全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问题。而且，任何一个社会个体，从其童年到晚年，无时无刻不是处在面临危机与挑战的环境中，随时随地的学习因此变得特别重要。因此，所谓大教育就是一种在时间上强调终身接受教育的“教育”，就是在空间上强调学校教育和社会、家庭教育相结合的教育，就是在手段上将有形教育和无形教育相结合的教育，就是更加强调受教育者的主动学习的教育。而且，在教育手段上，也是更加丰富多样，更加灵活机动。就实施教育这一任务的人员来说，不但教师依然是承担这一社会责任的基本成分，而且全社会成员都有实施教育他人且进行自我教育的责任。就实施教育的场合而言，则整个社会都是课堂，人生的任何领域都可以用来实施教育，完成教育过程。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种大教育与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是密切相关且融为一体的，教育的过程就是人类改造自然和完善自我的过程。只有这样的大教育，才能适应不断发展的社会变化，才能使人类不断得到完善和提高，成为身心各方面全面协调发展的新人。

本课题在论述中使用了目前国际教育界普遍使用的“终身教育”这个术语，因此也有必要在此先对其内涵与外延进行说明和梳理。

终身教育这一思想应当说不是今天才出现的，在古希腊罗马哲学、伊斯兰文化、古印度哲学以及我国春秋诸子的思想中已有表述。之后，在被称为“教育界的伽利略”的夸美纽斯、卢梭等西方学者那里也能发现类似的思想。但是，将“终身教育”视为影响整个教育体制和改变教育观念之重要内容的一部分，将其视为提高国民素质之有效方式和基本原则之一，则是自 20 世纪下半叶后才确立的，更确切的说法应该是近 30 年的成果。对于终身教育的定义以及对现代教育的意义，国外学术界有科学的阐述：

“无论人类是自觉地，还是不自觉地这样做，他们总是终生不断地学习和训练他们自己。这种学习和训练主要是通过周围环境的影响，通过亲身经验改变他们的行为、他们的人生观和他们的知识内容。然而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多少机构支持这种自然动力，使它不再是一种偶然机遇而是一种深思熟虑的设计。尤其有一种偏见，认为教学只是为青年设置的并且只是在学校进行的；这种偏见往往使人们不把终身教育当作是一种正常的教育。然而仅仅只有几年的工夫世界各地的人们已经认清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大多数人还没有作好充分的准备去应付 20 世纪后半叶这样的生活条件和社会变迁。千百万的成人需要受教育，这不仅是像过去一样为了使自己的能力日趋完善和对自己的发展有所贡献而得到幸福，而且也是因为 20 世纪全部社会的、经济的和文化方面的发展，都要求每一个受教育的公民尽可能地发挥他

的潜力。正如我们前面已经讲过的，教育只有在它的行动实质和空间时间方面经历了急骤的变化，简言之，只有采纳了终身教育的思想才能变成有效的、公正的、人道的事业。”

进入 80 年代以来，终身教育的思想已经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接受和实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多年来也将其作为一系列规划的中心和研究主题，对于终身教育的内容、特点和实施方式等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研究所 1974 年组织的一次会议上，为终身教育制订了五项原则：

第一，未来的教育改革应以终身教育为基本原则。

第二，教育改革不应局限于结构、内容和方法问题上，因为教育是建立在人际关系的基础之上的，所以教育应该注意培养教育者、家长和经济领导人所需要的行为。

第三，协调（结合）教育方面的传统与创新。

第四，企业应该改进其教育制度。而在更大的方面，政府主管部门应重新审议其教育管理制度。

第五，教育应以使所有公民均能为发展人类和平与进步做出贡献为目标。

此五项原则虽然是具体针对日本教育的，但无疑对世界各国的教育改革都有指导意义。

1978 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要求下，进行了一项主题为“罗马尼亚的终身教育”的研究。从 1980 年起，罗马尼亚在所有教师进修的课程中增加了一个专题，即“终身教育：概念和影响”，这表明世界各国已经着手为实施终身教育作出了巨大努力。在学术界的论争中，终身教育的概念作为素质教育的一项

富尔等著：《学会生存》，转引自《从现在到 2000 年教育内容发展的全球展望》教育科学出版社 1997 年版 第 137 页。

基本原则终于逐渐为人们所接受和丰富，例如瑞典还提出了“回归教育”的概念。又如成人教育，在过去仅仅是被视为学校教育的附加部分，如今被认为是组成整个教育体系的一个重要层次。在长期的实践和理论探索中，国际学术界对终身教育的性质和特点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如今已基本形成共识：

第一，终身教育具有整体特点。它面向全体人民，并把一切具有教育功能的机构（子系统）联系或连接起来。

第二，终身教育是持续的，它贯穿一生的整个过程，它也是全面的，因为它向每个人提供了进修和丰富知识的可能性：职业培训、社会文化培训等。

第三，在终身教育的系统中，任何个人都被鼓励进行参与，也就是认清培养的内容并加以掌握。与此同时，他也可以成为对他人进行教育的源泉。<sup>①</sup>

国际教育界对于终身教育的探讨正在深化，例如有人将个人的接受教育与人的异化问题结合起来，提出不能接受终身教育的个体实际上就不能免于被异化的可能。有人将终身教育与提高人的创造性结合起来，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有人则主要探讨终身教育如何缩小文化程度较高者与较低者之间差距的问题等等。对于终身教育，我国学术界业已接受此概念，不过对于它与提高全民族素质的关系，依然缺少深入的研究。对于作为时间概念的“终身教育”与作为空间概念的“无形教育”之间的联系也缺少研究。此外，关于成人教育与终身教育的关系，关于终身教育与家庭及社会教育的关系等，也有必要给予论述。对此，本课题将在有关部分给予专门的分析，试图根据

<sup>①</sup> 参见《从现在到2000年教育内容发展的全球展望》，教育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42~144页。

当前学术界在这方面的研究，提出一些引起关注的问题，并给出我们的看法。

### 三

对国民素质进行全方位的研究，并就提高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提出带有指导意义的原则和方法，这显然是一个高难度的课题。这种难度表现在它的完成需要跨学科的综合研究，需要课题组成员的密切配合，以便发挥各自专业方面的优势。而且，研究国民素质问题，不可避免地需要对民族文化进行较为全面的分析把握，对民族文化的形成及其特征有深刻的理解，对悠久的历史传统有史的概念，这就意味着在资料的占有上必须极为丰富和完备。同时，也应当对外来文化的传入以及由此对民族素质产生的影响有足够的认识，这实际上就要进行横向的比较研究。也就是要求课题能够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民族素质的比较中，对中华民族素质的形成，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有一个清晰的把握和细致的分析，特别是对民族素质中亟需提高和改进的部分进行深入论述，以便引起全民族的重视，尽早实施提高全民族素质的宏伟工程。所有这些，都对课题的完成和质量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也是课题的难度所在。对此如果没有清醒的认识，将导致对课题研究的不能深入和课题质量的不能保证。显而易见，如何解决课题组成员在知识、能力和准备方面的欠缺，将直接影响课题完成的水平。对此我们是有清醒认识的，并为此付出了最大的努力。然而，限于能力和水平，该研究必然会存在不少缺点，期待着专家和同行的批评。

就目前我们所完成的课题而言，尽管有着许多不足之处，但

如果说还有什么特色的话，则可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即我们在本书中所进行的跨学科、跨文化的比较研究；所提出的国民基本素质和理想素质的联系和区别；我们所极力强调的素质与文化传统的关系；强调素质与教育的关系；我们所提出的“大教育”概念以及实施原则；我们就终身教育与无形教育所作的论述；我们提出的建立科学思想方法与改造民族思维模式和提高民族素质的重大关系，以及必须从民族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源头方面寻求改造和提高民族素质的有效方式等等。虽然这些论述可能有不够成熟之处，却应该有其一定的学术价值。同时，该书并没有仅仅进行理论阐释，还就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切实可行的措施。因此，该书不仅对于理论研究者，而且对于从事素质教育的工作者，都是有一定参考和借鉴价值的。

关于对中华民族之国民素质研究的一般状况和学术界对素质研究的概况，限于所掌握的资料，目前还不能给出一个十分完整的描述。不过，为了说明我们此课题的起点和从事研究的现实依据，有必要就我们所了解的情况，给出一个大致的轮廓。

中国古代学者对于人性之形成以及人之素质与环境关系等问题是有所觉察并有其天才认识的，例如孔子对于个人自我修养的强调：“吾一日三省吾身”和“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例如老子对知人与自知问题的观点“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例如孟子的“性善说”和荀子的“性恶说”以及古人对“孟母三迁”故事的肯定；例如西汉董仲舒对人之个性的分类等，都显示出非常可贵的对人之素质问题的敏感和深刻认识。可惜，限于时代和社会的条件，传统道德所强调的，只是为了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个人理想，更由于传统文化的制约，致使他们的

探索无法深入，更无法上升到纯粹理论的层次进行总结，也就不能指导社会实践。另一方面，长期的封建统治和自然科学理论的发展缓慢，也使我们民族在研究国民素质问题上缺少必要的理论和思想准备，这是一个令人遗憾的现实。

真正对国民素质问题给予关注应该是在五四时期。当时的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出于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目的，大力提倡科学与民主思想，在引进西方文化的同时，也对中国传统文化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当时进行的中西文化论争中，人们对改造国民性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诸如什么是国民性、中国国民性的弱点是什么以及怎样改造它等，成为那一代学者最想解决的问题。有感于中国文化在近代以来的逐渐衰败和中华民族的落伍，当时的人们普遍意识到，要使中华民族重新崛起，就必须学习西方文化，以西方文化改造传统文化，重建中国文化体系，并对落后的国民性进行彻底的改造，以提高全民族的素质水平。

作为新文化运动主将的陈独秀，当时即将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进行比较，并作出这样的概括：第一，东方文化“以安息为本位”爱好和平，所以成为“雍容文雅之劣等”。第二，以家族为本位，个人无权利，遵循宗法社会时代之道德。第三，以感情为本位，“以虚文为本位”。而西方文化的特点是：第一，以战争为本位，主争斗，恶侮辱。第二，以个人为本位，主人权。第三，以法治为本位，以实利为本位。根据这样粗浅的比较，陈独秀对中国文化进行了猛烈的批判，认为在这样的文化体系中所生活的人们没有个人的人格，没有法制观念，素质低下，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生活。因此他主张全面引进西方文化，彻底抛弃传统文化。其观点不免过于偏激，却反映出其强烈的革命意识和与传统决裂的

大无畏品格。伟大的现代文学先驱鲁迅，更是将中国数千年的历史概括为“吃人”的历史，针对当时民众不觉醒、思想素质极为低下的状况，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在当时影响极大。

与此相对，以《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为首的一派，则主“中西文化调和论”，认为东方文化主静，西方文化主动，是两种不同质的文化体系，不可简单地加以比较以定优劣，只能互相取长补短，互相补充。应当说，杜亚泉的观点有其合理性，特别是在今天看来是如此。但在当时，杜亚泉的观点却容易被误解为是为传统文化辩护，是封建文化的卫道士，因此遭到严厉的批判。不过无论哪一派，当时都意识到改造我们的国民性问题的重大，由此思考自己的文化传统问题以及对外来文化的态度等，应当说对于提高国民素质起到了很好的思想启蒙作用。当时，美国实用主义大师杜威和英国哲学家罗素的访华，也促使人们对于中国文化问题、对于国民性问题进行关注和思考，此处不再展开。

后来，二三十年代，梁漱溟、林语堂等人，也以自己的研究，对中西文化比较问题以及中国国民素质特征等问题提出过有益的见解，在当时也曾产生很大的影响。

不过，真正对提高民族素质问题展开讨论并深化论题的，还只是在 20 世纪的最后 10 年。这一问题的提出首先带有极强的现实性，80 年代以来，西方一些国家开始进入后工业化社会，其信息工业的发达又使人称之为信息社会。以电子计算机为标志的现代科学技术，已经发展到令人目不暇接的程度，知识的更新换代日新月异，而“知识经济”这一口号的提出，更是意味着人类已经进入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在这样的形式下，如何提高我们民族的素质，使之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使我们的民族不致在未来的生存竞争中失败，就成为一个最现实的问题摆在全

国人民面前。邓小平同志最早意识到这一问题对民族命运的重要性，提出了要大力发展教育，甚至宁肯牺牲一点速度也要发展教育的重要思想。于是，教育问题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国民素质问题才又一次引起全国人民的关注，有关的理论探讨和实践也开始深入展开。在这方面，有一批研究成果值得关注，例如方建文等主编的《全面素质教育手册》以 200 多万字的篇幅搜集了大量国内外有关素质问题的研究论文和资料，是研究素质问题者不可不参考的重要文献。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大学人文启示录》，则从当代大学生人文素质状况及其应采取对策的角度，对素质问题进行了新的探索，出版后曾经引起了强烈反响。沈继英等主编的《面向 21 世纪的人才素质》一书则结合我国和世界经济发展的现实以及对新型人才需求的角度，对怎样培养跨世纪人才提出了很有见地的思想。方洲主编的《中国当代名人成功素质分析报告》，则是个案分析的典型。该书以对不同职业、不同类型的名人事业成功历程的分析为基础，提出了中国当代名人之所以能够成功的素质结构及标准，为广大普通民众理解名人和提高自己成功的自信心，提供了生动具体的例证，同时也从理论上给予了尽可能全面的分析，也是研究素质问题者必备的参考书。此外，对于素质与教育之关系方面，其研究专著更多，例如谢安邦等主持的《全国义务教育学生质量调查与研究》、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套教育丛书等，都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这方面的著作很多，对此感兴趣者可参看本书所附的参考文献部分。

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提高全民族素质问题是极为重视的，一再对此发表讲话，有关部门也一再制订政策和采取措施，就素质问题和素质教育问题以及教育改革问题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大

规模的的讨论，并在此基础上将提高素质问题正式纳入教育体制改革范畴。仅在 1999 年，有关部门就制订了诸如《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和《面向 21 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等一系列文件，促使教育改革和素质教育的深化。在学校教育方面，已经开始对应试教育进行改革，例如高考中就要实行的“3+X”考试科目改革，就是试图扭转高考这个指挥棒对广大青少年素质形成中的不良影响。可以说，提高素质已经成为全国各族人民的共识，并且得到党和国家的极大重视，在这样的形势下，本课题的完成可以说是我们献给全国各族人民的一个微薄的礼物。如果读者能从本书中多少得到一点启示，我们会感到由衷的高兴，同时也希望广大读者对此书提出批评和建议，以便将来有机会再版时进行订正。